

美日经济摩擦: 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范士明

本文对中国学者关于美日经济摩擦的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重点考察了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论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在问题领域,重点考察了美日对双边经济摩擦的管理,以及美日经济摩擦与其政治—安全关系的互动。文章最后考察了美日经济摩擦对中国的启示。

8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摩擦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这一方面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所处的地区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随着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增长,中国自己在对外关系中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经贸摩擦,而美日对经济摩擦的处理可以显示它们的经贸政策的走向。所以,分析美日经济摩擦,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无意再重复广为人知的观点,也无力就美日经济摩擦提出新的解释,而是希望就中国人的一些看法做出初步的归纳,并从中发现中国学者在分析类似问题时得出来的启示和反映出来的观察问题的方法或角度。

现实主义的观点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立足于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看待国家间的关系,重视相对获益甚于相互获益。这一点,较多地反映在中国学者对美日经贸摩擦的分析中。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评论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首先,现实主义者透过美日经贸摩擦看到的是两国实力的相对升降。在他们眼里,美国和日本在债权债务关系、国民生产总值、贸易差额和其他经济数字上的变化,说明的是日本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国关系的调整和动荡。80年代的情况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这种分析还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一度盛行的“美国衰落论”。其次,人们透过现实主义的镜头,看到了美日经济摩擦似乎是两国有目的的国家争霸战略的结果。一位很有影响的国际问题专家曾说“日本是以美国作为主要对手来部署攻势,进行挑战的。它不仅是要争取在经济、政治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更是处心积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超过美国,代替美国的经济霸权。有了经济霸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也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了”。再次,倾向于用现实主义方法看问题的人还认为,美日双方的经济冲突也和它们争夺区域经济支配地位的较量有关。他仍觉得美日欧都在搞区域经济集团化,“并努力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宦乡:“科学决策与国际环境”,《宦乡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01页。

扩大各自的外围势力圈,设法打入对方控制的市场。这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中失利,就有可能沦为被支配的地位”;美日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争夺亚太经济的主导权。

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美日经济摩擦的原因和实质,无法对这一问题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这种观点倾向于强调美日关系冲突的一面大于协调合作的一面,把摩擦看做是不断升级、走向危机和毁灭的过程。新的平衡建立在旧秩序的废墟上。他们认为,美日经济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会持续而激烈地发展下去”。虽然多数人并不认为在短期内美日关系会由于经济摩擦而发生根本变比,但倾向于认为,美日之间冲突的缓解和协议的达成“是暂时的、人为的,不是市场争夺的结果,日美间的经济摩擦必将再度激化”;“从中长期来看,一旦日本经济渡过困境,必然会与美国展开新一轮竞争,届时的贸易摩擦将更加尖锐”;而且,“日本因经济迅速增长而膨胀起来的能量终究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其结果是日本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增强,并且在国际气候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日美间更广泛的利益冲突。

现实主义者也倾向于用实力政治解释美日缓和和经济摩擦的努力,在美日谈判的过程中更多地看到“攻”、“守”而非妥协。他们注意到,在美日经济谈判中仍然是“美压日让”的模式:“战后以来的日美经济摩擦已发生过无数次,而每次总是以日方让步,局部解决问题而收场”;“美国始终处于积极进攻的态势,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相反,日本却处于被动守势,总是被美国贸易谈判的预定进程拖着走”。其结论是,“国际经济中的矛盾与斗争是实力的较量”。

相互依存的观点

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显然不同于“零和对局”的解释。相互依存强调相互获益甚于相对获益,认为利益融合对冲突有制约作用,但也承认在通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摩擦。首先,重视相互依存的人把摩擦的产生看做是依存的结果,认为“经济摩擦与各国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因为‘摩擦’只有在接触中、来往中、联系中才会发生”;“相互依存并不抹煞矛盾冲突,美日之间的许多矛盾正是产生于它们的相互渗透和依赖”。其次,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之所以如此剧烈是因为

参见季寅:“冷战结束后的美欧日三角关系”,《世界知识》,1991年第2期,第4页;章旺平:“亚太经济中的日美关系”,《日本问题研究》,1994年第4期,第31页;吴方桂:“美欧日关系进入权力再分配新周期”,《现代国际关系》,1990年第1期,第10页。

见张碧清:“国际形势剧变后的日美关系”,《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第9—10页。类似观点见胡磊:“国际经济冲突政治化刍议”,《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5—196页。

见张碧清:“国际形势剧变后的日美关系”,《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第9—10页。类似观点见胡磊:“国际经济冲突政治化刍议”,《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5—196页。

刘小林:“盟友还是对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第47页。

金凤德:“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日本问题》,1983年第3期,第25页。

朱文莉:“竞争性的相互依存”,《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第69页。

它们的资本主义模式差异如此之大,难以相互适应,“磨合”颇费周折。比如,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美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日本重视储蓄和生产,美国倾向于鼓励消费;日本战后重点发展民用技术,美国一度侧重开发军事技术;日本公司、银行间相互持股,美国公司则相对独立于金融机构;日本公司重视员工劳保,美国企业可能更关心股东利益;日本有较清晰的产业政策,美国政府在产业发展上参与较少等等。

相互依存论者也不认为美日经济摩擦可以彻底解决,因为他们把依存和摩擦看做伴生的,但他们似乎倾向于认为不断产生的摩擦可以通过不断的协调加以解决。第一,相互依存的发展改变了一些人对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旧的看法。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探讨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在一国内和国家间发生的传统马列主义没有预见的变化后,指出:“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并且它们之间最终将爆发战争的论点,对于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第二,重视相互依存的人认为美日间的依存加强了双方的协调力,会防止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美日关系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加深过程中的新模式,从贸易深入到双方经济结构和基础的适应性调整,双方近二十年的碰撞协调导致双方竞争能力的提高,经济交往层次的深化和高级化。”第三,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的经济或综合实力会超过美国。“日本不但不能取代美国,而且不能仅依仗它的经济大国地位摆脱美国自搞一个局面”。总之,在看待美日经济摩擦的前景时,“既要看到美日贸易摩擦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又要看到其冲突的可限制性和可调和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美日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合作超过分歧和冲突,认为“冷战”后美日关系中矛盾和冲突将日益尖锐并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日处理经济摩擦的启示

美日对经济摩擦的管理是指双方的政策、协调和谈判。在60年代中后期,当美日纺织品贸易摩擦初起的时候,双方的协调管理就已经开始了。六、七十年代,美日间对经济摩擦的管理是从日本被迫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ERs)开始的。虽然相对于摩擦来说,双方的协调和管理始终具有较多的被动性质,但实际上,随着摩擦的升级、领域扩大,美日对经贸摩擦管理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变化。使用的手段从贸易政策,发展到以汇率变化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再触及到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各种综合办法。除双边的谈判、调整外,美日还在关贸总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多边场合进行协调。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两国的经济摩擦持续扩大,但要具体分析,并不能简单地讲双方的管理没有作用。因为旧的矛盾趋于缓和,新的问题又继而兴起,而且管理本身也走过了从“治标”到“治本”的道路。

参见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624—646页。

厉以宁:“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见宦乡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李国友:“跨世纪的美国经济”,《美国研究》,1990年第3期,第80—81页。

陈鲁直:“从东北亚看太平洋地区格局”,《现代国际关系》,1989年第2期,第8页。

参见张健:“九十年代美国贸易政策趋向”,《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郑寅:“亚太地区的五方多角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10期,第2页。

参见 Fred Bergsten & Marcus Noland (ed.): *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US-Japan Economic Conflict*, Washington DC: Ins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pp. 15—17.

美日协商谈判深入到各自国内政策的情况发人深省。特别是在美日结构障碍谈判中,美国提出的要求在有的中国学者看来“象要对日本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也向美国提出了许多相应要求。一位中国学者在评论美日关系时说:“相互依存的结果是朝着无国界的经济前进。相互依存的另一结果是走向无国界的政治。……一国内事务常常会与国际事务分割不清。长期以来被认为国家主权禁区的财政、货币和税务政策,现在也成为可在国际上协商的项目了。……总之,两国相互依存愈深,就会愈加相互干预内政”。美国学者曾有人讨论不同资本主义模式趋同的问题,中国学者少有人认为基于不同资源禀赋、商业习惯和文化观念的日本会被美国彻底“改造”过来,不过,却有人注意到美日均吸收了对方的某些经验。

很多中国学者指出,解决美日的经济摩擦要从解决双方各自国内的问题做起,日本需要放弃市场保护的态度,改变“经济增长主义”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打破财、官、商的结合形成的不公平竞争。美国也应该停止寻找“替罪羊”。一位中国作者说:“日本问题”实际上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唯一最好的解决途径是实现克林顿竞选时许下的诺言——振兴美国经济。一般人都同意,美国自80年代中后期,日益强调“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突出做法是依靠单边立法,向对方施压,且以结果为导向,态度日趋强硬。“超级301”就首先是从威胁日本开始使用的。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这种“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 unilateralism),“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的典型表现,这种立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但在分析“公平”、“管理”贸易是否是自由贸易时,中国学者中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倡导的“公平贸易”不过是保护主义的幌子,是“变相的保护主义”,会导致贸易大战。有人则认为,保护主义重在限制进口,而美国的贸易政策意在打开市场,扩大出口;“公平贸易”强调互惠,虽然在个别领域包含保护主义措施,但基本性质和主导倾向仍是自由贸易。

笔者认为,进一步考察美日间对经济摩擦的管理是很有必要的。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民族经济一方面界限正在模糊,一方面受到超国界经济的猛烈冲击。经济一体化不仅带来利益,也带来痛苦,甚至对某些行业、部门产生破坏性影响。但是,即使在象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人们也不见得对经济的全球化作好了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准备。政府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管理滞后,民众的民族情绪更容易火上浇油。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原各加盟共和国间的相互依存虽然可能与美日间相比有所不同,但经济上的彼此依赖已经相当深入,可这仍然没有阻止分裂和战争的出现。这些事例让人深思。经济上的依赖不是避免民族、宗教冲突的充分条件。防止依存中的冲突演化成相互毁灭的关键不是依存可以自然地遏止这样的发展,而在于既依存又冲突的各方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协调和管理。因此,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征服、利用自然能力的发展,还表现在治理自己和处理彼此间关系的能力的进步。虽然美日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和新闻媒体上的相互攻击

吴展:“既合作又斗争的伙伴——论美日关系”,《美国研究》,1990年第3期,第14,22页。

刘增祥:“日元升值与美国的日本问题”,《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第23页。

蒋欣:“美国贸易立法的演变及时中美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7期,第55页。

张键,前引文,第41—47页。

暴露了民族情绪的高涨,然而双边的和多边的协调机制仍在起作用。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不仅在一国内部逐渐发展了自我协调机制,在相互关系上也出现了有效的协调。当然,美日经济摩擦之所以没有造成两国关系的破裂,除了双方的依存、协调外,政治、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这种国际环境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美日经济摩擦的政治—安全方面

美日经济摩擦与双边和地区的政治—安全关系的互动是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话题。这其中包括,安全环境如何影响了经贸关系;经济摩擦的政治化;经济摩擦是否会改变安全上的现有安排等。首先,很多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冷战”作为外在环境与美日经贸摩擦的关系。一方面,“冷战”是美日形成政治—安全上合作,经济上冲突这样一种失衡的同盟关系的主要原因。出于对付共同威胁的需要,美国对日本一度采取经济扶持,安全保护的 policy,并向西方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制这一公共产品,助长了日本出口型经济模式的形成。而相比之下,日本则节省了大量安全保障方面的开支,发展民用生产,加强了竞争力。另一方面,“冷战”的存在又起到了让双方克制,防止经济摩擦从根本上损害安全同盟的作用,即所谓的双边关系“安全防护毯”。中国学者评论其为“兄弟睨于墙而外御其侮”。

其次,中国作者们关心美日经济冲突的政治化,即经济摩擦引起的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摩擦。《日本可以说“不”!》这样的书籍被迅速介绍进中国。多位中国学者在文章、书籍中引用从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意测验结果,说明美国和日本国民对对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并介绍双方的主要观点。比如,美国人认为日本要把美国变成“经济殖民地”,日本反驳说美国要把日本变成“精神殖民地”;美国人把日本看成“威胁”,日本则要对美国说“不”,以及双方大多数人都认为对方国家应承担经济摩擦的主要责任等。有中国观察者注意双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报刊,在塑造对方的负面形象中的作用。它们把日本人描绘成“经济动物”,说日本要“购买美国”,是“异质的”,是美国的“威胁”等。中国学者认为这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恶化了政治气氛,而且公众心理上对对方反感加剧了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再次,中国学者密切关注美日双方在安全和经济关系间寻求平衡的努力,特别是日本是否会通过增加军费或扩大安全义务减轻美国的负担,以缓和经济摩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中国对日本加强在亚洲的安全作用一直表示担心,而 80 年代,美国一度有人要求日本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以减小经济摩擦并平息美国人的不满。一些美国人认为的日本应多生产一些飞机、大炮从而减少向美国出口商品的看法颇让中国人担心。中国学者在文章中引用美国官员和学者的话说,日本的防务费增长一倍对邻国来说很敏感,不仅会引起日本国内政治的动荡,还会引起地区安全的不稳定。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日安全同盟本来就有制约日本的作用,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日本增加安全作用,不仅对美日经济摩擦“治标不治本”,是否还会损害美国的安全主导地位呢?美国的目的是既要日本分担费用和义务,又不让它独当一面,既利用,又限制。

参见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

美国人的该主张可参见 David Mason & Abdul Turay (ed.): *US-Japan Trade Friction: Its Impact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Basin*, ST. Martin Press, 1991, p. 32

刘世龙:“80 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战略思想”,《日本学刊》,199 年第 3 期,第 10—11 页。

最后,也有中国学者认为,90年代中,美日有可能在安全关系中寻找受到经济摩擦冲击的凝聚力。克林顿政府放弃了把经济明确列位美日关系头号支柱的提法,重新把安全作为首要因素。在“日本经济威胁论”在美逐渐消退的同时,却兴起了“中国威胁论”,恐怕并非巧合。让中国学者疑虑重重的还有如日本论者中辉西政的评论:“目前,日美之间存在着经济摩擦,但一般来说,现在尚未找到能积极促进日美同盟关系的主要因素。如果有一种可能,那只能是缘起于美、日、中三角关系所带来的力量。”如果美日希望通过巩固安全同盟加强凝聚力,而中国又成为它们巩固安全同盟的理由,是不是中国因素帮助美日完成了双边关系中一次不易的调整?

美日经济摩擦对中国的启示

在近现代历史上,作为东亚近邻,日本一度是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物之一。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较短时间就奇迹般地崛起,成为堪与美国一争高低的经济“超级大国”;不能不令中国人深思。中国人在美日经济摩擦中看到了日本经济的威力,所以介绍日本经济起飞和发展模式的文章书籍在80年代时而可见。这些介绍,或明或暗地提示中国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有人认为日本经济成功与其发展前期实行了重在保护市场的“进口替代”政策密切相关;有人认为使日本成功的经济政策的中心不是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产业政策;有人强调日本抓住时机,利用国际市场的经验;还有人突出其政府的调控和官民的协调。不过,也有人看到了日本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主义”导致“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公害”、“严重的经济摩擦”等,提醒“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意味着经济可以代替一切”。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更有人明确警告不可重蹈日本的覆辙。

在中国作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美日经济摩擦似乎对中国既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有利的是,美日经济摩擦的加剧迫使日本加快转移某些产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创造了更多的投资和技术合作的可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而且,美国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扩大内需,消除结构性障碍,不仅为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打开了通道,也为其他国家对日出提供便利条件。不利的是,美日经济摩擦一旦加剧,也从几个方面殃及他国。其一,美日经济摩擦出现向他国扩散的趋势。日本在转移产业的同时也转移了同美国的贸易摩擦,引起东亚其他国家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张。其二,美国对日实行的贸易压力手段也开始使用于其他国家,“‘超级301’不只针对日本,也针对所有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国家,亚洲国家自无法幸免。”其三,美日经济摩擦恶化了地

转引自倪峰:“美日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参见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日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19—221页。

参见金凤德:“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再研究”,《日本问题》,1986年第6期,第1—8页;崔勇列:“关于战后日本经济政策的一种思考和解答”,《日本问题》,1990年第4,111页;孙凡静:“日本发展经济经验的总概括”,《日本问题》,1990年第6期,第1—8页;柳长生:“试论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经济的飞跃发展”,《日本问题》,1990年第5期,第12—14页。

参见宋绍英:“日本经济增长主义双向效应论”,《日本学刊》,1992年第2期,第9—18页;王微:“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启示”,《世界知识》,1993年第15期,第15—16页。

柯居韩、陶坚:“美日贸易冲突再度升级”,《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4期,第12页。

柯居韩、陶坚:“美日贸易冲突再度升级”,《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4期,第12页。

区经济环境, 由于汇率、利率的变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负担加重等问题。

美日经济摩擦也让中国学者对呈扩大之势的中美经贸摩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果, 对美国的贸易立法情况、贸易决策机制的介绍更多了。不过, 大多数作者还是强调, “中美之间的这种补偿性贸易逆差, 和美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那种竞争性贸易逆差有着本质的区别。对美国经济真正构成威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例如日本的小汽车等。这种由发达国家引起的竞争性外贸逆差, 才是美国朝野应予充分重视和认真对付的。” 他们还着重指出, 中美贸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转口贸易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带来的, 而且美国对华出口仍有很多限制。但是, 正如我们在美日经济摩擦中屡次看到的, 引起美国公众和新闻媒体注意的往往是数字, 而不是数字背后的原因。美国政府的目标也只是减少和消除这些对美不利的数字。

总之,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美日经济摩擦的分析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观点上都存在很多不同, 而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很多中国人目前看待国际事务的矛盾心理。从分析方法和角度上讲, 有人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视角, 立足于国家、权力、竞争这样的概念, 也有人强调一体化、相互依存、协调等。这样的分类或许过于简单, 但基本可以说明问题。不同的观察角度就美日经济摩擦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更有趣的是, 有时同一个人也在两种思维方式间徘徊。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 中国公开发表的主流看法似乎倾向于认为多极世界要比单极世界公平和稳定, 而美日经济矛盾的上升和日本独立性的增强和这个趋势似乎是一致的, 应予鼓励。可是, 如果日本经济实力和政治独立性的增强意味着其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 又不是中国人乐意看到的。具体到美日经济摩擦对中国的经济影响, 在中国学者看来也有两面性: 美日经济摩擦的加剧和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扩大经济合作的机会, 然而日元汇率波动, 美国政策日趋强硬等, 又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问题。美日两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的互动也让中国人充满了疑惑。虽然美日经济摩擦自 90 年代中以来有所缓和, 可是在中国学者头脑中存在的问号却仍然期待着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交流去加以解决。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